



弗·杰姆逊

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三个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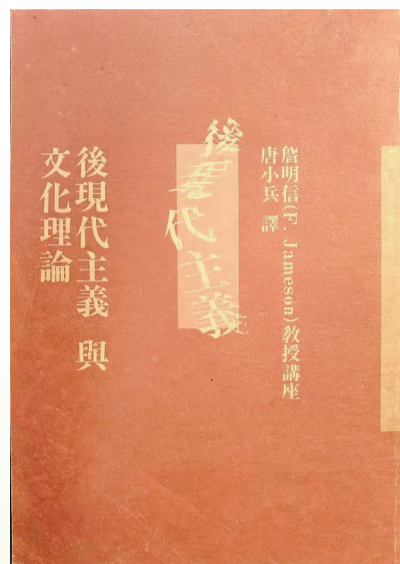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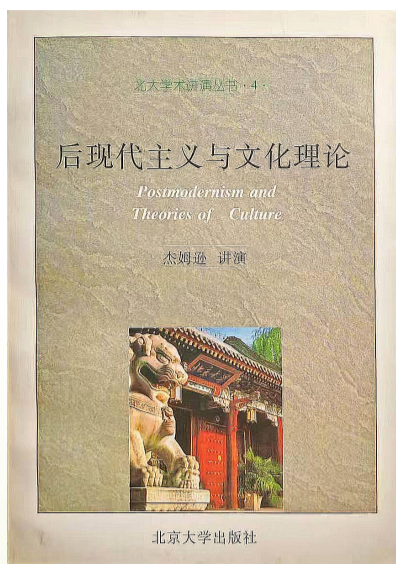
□刘涵之

这里说《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三个版本是指该书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三家大陆、台湾出版单位的印行版本情况。

1985年9月至12月，美国杜克大学的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教授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国际政治系国际文化专业之邀，用英文在北京大学开设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课程录音经时任北大英文系教师唐小兵翻译成中文。1986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专题讲演稿，书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印数5000册。翌年8月，该书印行第二版，印数10000册。关于该书的出版，翻译者唐小兵后来在台湾版“译后记”这样回忆：“八六年秋《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一次在大陆出版时……只可惜我从八六年夏便匆匆西走美国，来不及校对书稿，结果次年初首次隔洋收读成书时，颇因白底黑字的错印衍文而难堪窘迫了一番。不料是书迅速重印一万，大有燎原之势……”

1987年夏，杰姆逊教授到台湾讲学，反响强烈而成“风云人物”，故台湾的《当代》杂志有意在台中重新出版杰姆逊的北京讲稿。1989年2月，合志文化出版译者唐小兵订正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台译詹明信)特地为台湾版撰写序言，该书列“当代学从”之一。台湾版销售火热，故两个月后，该书再版，1990年1月又再版。1990年5月，该书附录杰姆逊的《意识形态诸理论》一文再次新版，是为台湾版的增订版。

1996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推出由乐



黛云主编的“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列为“北大叙述讲演丛书”之四于1997年1月出版，该版增加了杰姆逊的台湾版序。在该书的“再版琐记”中，唐小兵这样写道：“在当代学术思潮驳杂斑斓，推陈出新加速的情形下，一本讲解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小册子，竟能流传十年不衰，而且由三家出版社在大陆和台湾一版再版，实在是个令著者和译者都很兴奋的现象。”2005年6月，北大社再次推出该书国际开本的“精校本”，“精校本”效法台湾版，增加了与该书内容关系密切的数幅铜版纸插图，印刷精美。

从1986年到2005年，《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三个版本，共十八次的印行对于两岸增进有关西方当代文化理论的了解，功不可没。杰姆逊教授1985年秋第一次来到中国，来中国之前，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学习了将近三年的汉语，他在北大专题讲座的开场白曾用中文这样表达他的中国之行、介绍他的讲解内容：“这

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我内心的兴奋，实在不是语言可以充分表达的……我的演讲主要是向各位介绍当代西方的理论与文化里的各种观点和争鸣，从心理分析到后结构主义，从符号学到辩证法传统(也就是通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是讨论的范围。”1984年，杰姆逊升任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同年，他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al of Late Capitalism* 一文(译为《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该文可谓作者对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对资本主义文化的阶段性和文化症候做出了首创性的分析，引发了激烈和持续的讨论，也加持了他左派理论大家的身份和地位。也许是带着该文发表的余温，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讲稿秉持了他的后现代批判原则和历史整体观，其锋芒和旨趣格外显著，就像他在该书的台湾版序言告诫中国读者一样：“应该由中国读者来决定一种新生的当代中国文化，应该和西

方后现代主义(包括理论)保持怎样的关系，同样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是晚期、但同样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逻辑的一部分……那些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宣言中，屡见不鲜的关于欲望、差异的辞术，以及五花八门的新自由，都需要认真地放回历史环境，要放在西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框架中去观察，然后才能评断其自身的哲学、社会性价值。”事实上，该书在刷新大陆理论界耳目的同时，对大陆学界学习西方五花八门的文化理论有着引导作用。以至于不少学者不管赞同还是反对杰姆逊的学术主张，都会不同程度提及初次阅读该书的兴奋、惊异之情。换句话说，西方当代理论尤其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在中国的登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是起着启蒙式的、基础性的作用的。

稍具体说起，如果探寻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旅行轨迹，称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充当了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也许不为过。该

书在大陆、台湾的出版和热销(颇有趣味的是，该书在大陆、台湾两地出版由铅字印刷、激光照排到胶片精印，由32开本到国际开本本身就折射了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刷文化的发展)，既可理解为理论界双向回应西方当代理论的姻缘和时代际会，又可理解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界做出的主动选择，其意义需要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方法热的大潮和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后的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思想状况等方面来阐发。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历史化”，大体折射出当代西方理论引进和转化的契机和路径，比如1985、1996、2005等这些节点年份，就清晰勾勒出后现代文化理论(乃至后现代主义)被接受、深描的文化地图和景观。这样的文化地图和景观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学界感知现实和世界的理论生产过程——探讨该书价值不是小文的目的，不过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三个版本的出版、再版的时间节点，的确可以观察到理论旅行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理论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融合局面，证实了杰姆逊本人的一个判断：“应该重视的是某种交融汇合，即当今世界各地正不断生产出来的一整批非西方的风格和形式，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结构和形式之间的交汇。”当然，交汇到何种程度，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就像他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在北美引起的争议一样，《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是杰姆逊在中国被广泛阅读和讨论的一本代表作，这部作者唯一没有英文原著的中文著作，在中国获得的学术声誉是“理论之树常青”“生活之树常青”的证明。理论常青是因为其解释的历史效应，而生活之树常青则意味活生生的现实对理论的接纳之深、之广。今年9月22日杰姆逊去世，我想缅怀这位杰出的理论家、批评家，还是有必要提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版本。可以预见，未来的学者，如果要写作杰姆逊的学术年谱，也离不开对《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出版考察。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植根于黎巴嫩大地的艺术“先知”

——谈纪伯伦和他的《人生箴言录》

□刘金祥

雪松，是黎巴嫩的国树，被当地人视为纯洁和永生的象征。但还有一棵果决坚毅、绰号多姿、卓尔不群的雪松，其深深植根于黎巴嫩大地，枝繁叶茂地伸展到阿拉伯世界和全球各地，这就是黎巴嫩著名诗人、画家、哲学家、艺术家纪伯伦。作为当代阿拉伯文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作为阿拉伯艺术史上第一个著名流派——旅美派的旗帜性人物，纪伯伦为世界各地读者存留下诸多文学经典和艺术精品。由漓江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的《人生箴言录》就是纪伯伦文学经典作品的精选文集，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深刻地感受到纪伯伦的哲人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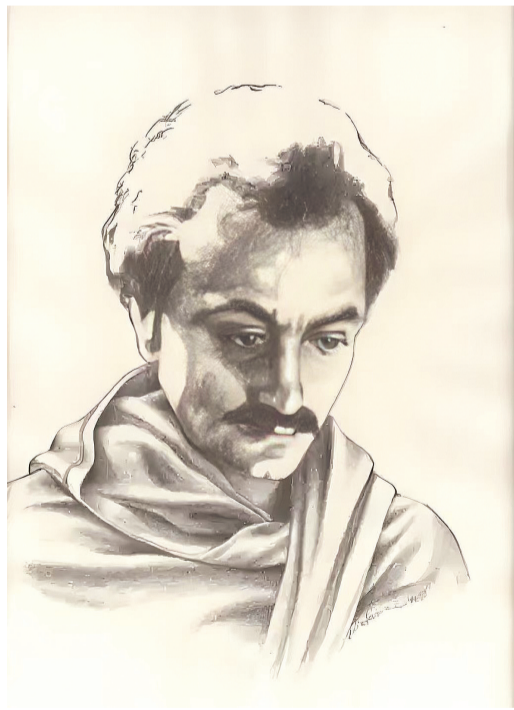
纪伯伦的名字最初是在北美大陆发光闪亮，嗣后如同一阵飓风疾传遍欧洲，继而风靡全球每个角落，获得广泛赞誉，就连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禁不住啧啧称许：“纪伯伦是最早从东方吹来的风暴，横扫了西方，但它带给我们海岸的全是鲜花。”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对纪伯伦也不吝褒奖之语：“真诚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纪伯伦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极度真诚，和他对人类的信念。”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省滨海圣谷贝什里，出身于马龙派天主教家庭，幼年时未曾受到正规学校教育。后随母亲移居美国，在美国波士顿上学时显露出艺术天赋，后来兴趣转向文学，初期用阿拉伯语，后用英语从事写作。纪伯伦的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和东方精神，作品不以情节为重，旨在抒发丰富的情感，其代表作《泪与笑》《先知》《沙与沫》等，1908年至1910年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期间，一代大师罗丹曾肯定而自信地评价纪伯伦：这个阿拉伯青年将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纪伯伦的绘画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在阿拉伯画坛占有独特的地位。他毕生创作了约七百幅绘画精品，其中的大部分被美国的博物馆和黎巴嫩纪伯伦纪念馆收藏。1931年4月10日，因肝硬化和肺结核以及长期严重酗酒，纪伯伦逝世于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圣芳心医院。鉴于纪伯伦的诗歌、小说、散文和绘画都深受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影响，他也由此被誉为“20世纪的威廉·布莱克”。

纪伯伦的文艺作品以“爱”与“美”为主题，

吟咏母爱、歌颂祖国、赞美自然、思念故乡，其诗其文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那伤感的情调和奇丽的比喻，形成了唯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英语中甚至有了“纪伯伦体”这个词。纪伯伦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国拥有大量读者。早在1923年，纪伯伦的散文诗就由茅盾先生翻译介绍到中国。1931年，作家冰心翻译了《先知》，为中国读者深入了解纪伯伦开启了文学的窗扉。2014年九州出版社根据黎巴嫩新版《纪伯伦全集》翻译引进了中文版，由李唯中翻译，全集不仅收有纪伯伦的散文诗，还囊括了他的小说、散文、演讲、话剧、书信，以及纪伯伦生前亲手绘制的插画，全集共分为七册，分别是《先知》《沙与沫》《泪与笑》《爱你如诗美丽》《蓝色火焰》《光与静默》《叛逆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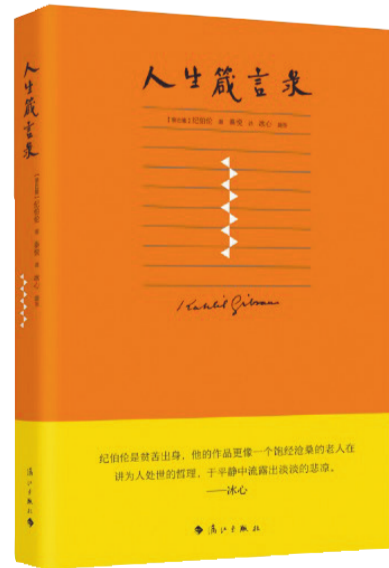
1943年，在纪伯伦逝世60周年之际，美国华盛顿市政府兴建了“纪伯伦公园”，并在公园内竖起纪伯伦的塑像。一位旅居美国的外籍艺术家，能在当地获得如此殊荣，根本原因在于其作品具有高超的艺术品位和深邃的思想意境。冰心说过：“纪伯伦是贫苦出身，他的作品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为人处世的哲理，于平静中流露出淡淡的悲凉。”诚哉斯言，纪伯伦的作品引导读者与他一起欢愉感恩，启诱读者与他一道驰向明丽的天空，与东方的另一位伟大作家——鲁迅和泰戈尔一样，纪伯伦诗歌所描摹和探究的是生存本质和生命根底。

《人生箴言录》一书从英文译出，遴选和收录的是散见于纪伯伦不同作品中的格言和哲理诗歌、哲理散文等，大都氤氲着对人生和社会的深挚关切与深度思考。书信是《人生箴言录》的奇珍异宝，璀璨夺目之下让读者更加贴近纪伯伦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书中以近乎一半的篇幅辑录了纪伯伦不同时期与亲朋好友的来往信件，这些书信以轻柔秀隽的笔调丰富了纪伯伦的精神形象，呈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与睿智，也正是这些信件不自觉地勾勒出纪伯伦的自画像，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纪伯伦的亲情和友情，尤其是他与女作家梅·依安黛之间炽热而纯真的爱情，这些以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生感悟，绝大部分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礼赞和歌吟赞美与爱是《人生箴言录》的基调和主题，按照纪伯伦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美和爱



纪伯伦自画像

人类和平与世界和谐的本源和基石，他在散文集《泪与笑》中主张和倡导，“人生有两件东西弥足珍贵：一是美，二是真。我在有爱的人的心里发现了美，在劳动者的手上发现了真”，“人们要相信美的神奇力量”，因为“美是人们生命的开端，是人们热爱生命的起源，因为美可以把人们的灵魂返璞归真为大自然”，“一个人在心中渴望的美，比眼中看到的美更崇高”。他谆谆告诫读者“只有美中才有真理，那真理颠扑不破；只有美中才有光明，那光明驱散黑暗，使人免受欺骗”。纪伯伦在书中倾述爱情的欢愉和失恋的痛楚，并联想到黎巴嫩的穷困与苦难，指出“爱是最高形式的正义”，“人们追求冰冷的物质，我却追求爱的火焰”，“温柔和善良不是软弱和绝望的表现，而是力量与决心的证明”。纪伯伦在书中真诚地表达着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留恋与珍爱：“您是我们心魂中的光与火，您是我们胸中跳动的心脏！”《人生箴言录》一书中的哲理诗是纪伯伦独创的一种文体，它一方面迥异于欧美作家的写作，另一方面又不



《人生箴言录》，【黎巴嫩】纪伯伦著，漓江出版社，2023年4月

同于东方作家的手法，正是基于这一点，西方文艺理论界称纪伯伦是位“用心灵的血滴和灵魂的汁液创作的诗人”。格言、通信和哲理散文，《人生箴言录》每一个类型和每一种题材都在展示着不同精神样貌的纪伯伦，展示着他的思想。

纪伯伦是以文学家和艺术家身份出现的一位“先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纪伯伦不仅仅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人类所有的时代；纪伯伦不只为黎巴嫩所单独拥有，而且也为全世界所共同拥有。在《人生箴言录》中，纪伯伦以一名大彻大悟的先哲角色应答提问，无论是对人生中的美与爱、爱情与婚姻、自由与法律，还是故国与他乡、理智与情感、友谊与死亡，纪伯伦如同尼采塑造查拉斯图拉那样阐述自己的理念、观点和价值取向，为自己也塑造了“亚里斯塔

法”这样一个先知，表达和传递自己的人生感知和文学体悟。特别是在阐发和解释爱时，纪伯伦写道，“爱只奉献自身，也只从自身中获取。爱不占有，也不愿被占有。爱在爱中一无所求”，“但愿我的生活亦泪亦笑：泪，可以净洁我的心灵，使我晓知生活的秘密与奥妙；笑，可以使我接近同胞，并成为我赞美主的象征与记号”。在纪伯伦的精神界域中，爱是纯洁崇高的，是圣洁清纯的，它与私欲无碍无涉。纪伯伦的墓地设在他的故乡黎巴嫩北部古老的贝什里村那片雪松旁边，纪伯伦的好友——与他比肩齐名的侨民作家米哈伊勒努埃曼说：“纪伯伦不需别人用石雕、铜像来纪念他，作为一个人，他比石雕、铜像都更为不朽……对他最好的纪念，便是在人民中传播他的文学艺术作品！”1931年纪伯伦逝世后，有人在他的墓地里立了块石碑，上面镌刻着“我们的先知纪伯伦安眠于此”。“先知”与“孩子”在阿拉伯语中只需改变字母上下的圆点符号，然而就是这一微小的改动却将纪伯伦从遥不可及的云中放回到充满人间烟火的现实。这棵黎巴嫩的雪松将永世长青不衰！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一带一路”文学之光

